

凤凰文库·政治学前沿系列

# THE PRACTICE OF LIBERAL PLURALISM

## 自由多元主义的实践

[美]威廉·A·盖尔斯敦 著  
佟德志 庞金友 苏宝俊 译



凤凰文库  
PHOENIX LIBRARY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PHOENIX PUBLISHING & MEDIA GROUP  
江苏人民出版社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凤凰文库·政治学前沿系列

# THE PRACTICE OF LIBERAL PLURALISM

## 自由多元主义的实践

[美] 威廉·A·盖尔斯敦 著  
佟德志 庞金友 苏宝俊 译



凤凰文库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PHOENIX PUBLISHING & MEDIA GROUP  
江苏人民出版社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自由多元主义的实践 (美)盖尔斯敦(Galston, W.)著; 佟德志, 庞金友, 苏宝俊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9. 6  
(凤凰文库·政治学前沿系列)

ISBN 978 - 7 - 214 - 04874 - 5

I. 自… II. ①盖… ②佟… ③庞… ④苏… III. 自由主义—研究 IV. D09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99730 号

---

书 名	自由多元主义的实践
著 者	威廉·A·盖尔斯敦
译 者	佟德志 庞金友 苏宝俊
责任编辑	王翔宇
装帧设计	许文菲
责任监制	王列丹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 210009)
网 址	<a href="http://www.book-wind.com">http://www.book-wind.com</a>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 210009)
集团网址	<a href="http://www.ppm.cn">凤凰出版传媒网 <a href="http://www.ppm.cn">http://www.ppm.cn</a></a>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盐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960mm×1304mm 1/32
印 张	8.25 插页 4
字 数	22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印次
印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214 - 04874 - 5
定 价	25.00 元

---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随时向我社出版科调换。

# 出版说明

要支撑起一个强大的现代化国家，除了经济、制度、科技、教育等力量之外，还需要先进的、强有力的文化力量。凤凰文库的出版宗旨是：忠实记载当代国内外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促进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为推动我国先进文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丰富的实践总结、珍贵的价值理念、有益的学术参考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资源。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人类文化的高端和前沿，放眼世界，具有全球胸怀和国际视野。经济全球化的背后是不同文化的冲撞与交融，是不同思想的激荡与扬弃，是不同文明的竞争和共存。从历史进化角度来看，交融、扬弃、共存是大趋势，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总是在坚持自我特质的同时，向其他民族、其他国家吸取异质文化的养分，从而与时俱进，发展壮大。文库将积极采撷当今世界优秀文化成果，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现代化的建设，面向全国，具有时代精神和中国气派。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的背后是国民素质的现代化，是现代文明的培育，是先进文化的发

展。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进程中，中华民族必将展示新的实践，产生新的经验，形成新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文库将展现中国现代化的新实践和新总结，成为中国学术界、思想界和理论界创新平台。

凤凰文库的基本特征是：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中心，立足传播新知识，介绍新思潮，树立新观念，建设新学科，着力出版当代国内外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科学文化的最新成果，以及文学艺术的精品力作，同时也注重推出以新的形式、新的观念呈现我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优秀作品，从而把引进吸收和自主创新结合起来，并促进传统优秀文化的现代转型。

凤凰文库努力实现知识学术传播和思想理论创新的融合，以若干主题系列的形式呈现，并且是一个开放式的结构。它将围绕马克思主义研究及其中国化、政治学、哲学、宗教、人文与社会、海外中国研究、外国现当代文学等领域设计规划主题系列，并不断在内容上加以充实；同时，文库还将围绕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科学文化领域的 new 问题、新动向，分批设计规划出新的主题系列，增强文库思想的活力和学术的丰富性。

从中国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这样一个大视角出发，从中国现代化在世界现代化浪潮中的独特性出发，中国已经并将更加鲜明地表现自己特有的实践、经验和路径，形成独特的学术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这是我们出版凤凰文库的信心之所在。因此，我们相信，在全国学术界、思想界、理论界的 支持和参与下，在广大读者的帮助和关心下，凤凰文库一定会成为深为社会各界欢迎的大型丛书，在中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中，实现凤凰出版人的历史责任和使命。

凤凰文库出版委员会

## 译者的话

作为自由多元主义的奠基人和倡导者，盖尔斯敦以其《自由多元主义》一书成为学术界的焦点，引发热议。在一片赞许声之外，当然也少不了批评。本书就是作者对这些批评进行回应与反思，并进一步扩展其自由多元主义理论的结果，同时，也是作者将自由多元主义理论应用于实践得出的一些结论。从这个意义上讲，读者将本书同《自由多元主义》一书结合起来读，可能更有获益。

从总体上看，在本书的第一、二、四部分，作者主要集中于对批评的回应和对自由多元主义理论的反思；第三部分则是作者将自由多元主义理论应用于实践得出的某些结论。作者在第2、3、4章逐一探讨了价值多元主义、政治多元主义和表达自由的观念，这三个观念是自由多元主义的理论基础。在第5、6、12章，作者把对价值多元主义的分析拓展到政治行为、道德动机和国际范围，这是自由多元主义的三个拓展。第10章、11章回应了在平等和多样性方面对自由多元主义的批评。第三部分的第7、8、9章则通过公共哲学的概念广泛地探讨了公共生活、经济生活、现代市场等问题，这些内容侧重于把自由多元主义理论应用于具体的社会生活实践。

当然,对自由多元主义的理论拓展和实践应用是结合在一起的。在讲述理论时,盖尔斯敦结合了大量的实例;在把理论应用于实践时,盖尔斯敦亦没有离开对理论的分析和深入。这也是盖尔斯敦学术研究的一个特点。实际上,对自己政治哲学的学术生活,盖尔斯敦这样要求自己:“对政治哲学的学术生活,我付出了很多,但是,我没有,而且也从未奢求成为一个职业的道德哲学家。”然而,盖尔斯敦一直都没有离开政治哲学领域,只是他对政治哲学的研究更富有时代性,更多地同政治实践的重大理论问题联系在一起来完成的。

## 一、自由多元与自由民主

无论是《自由多元主义》,还是这本《自由多元主义的实践》,都渗透了盖尔斯敦想在变化了的经济社会环境下提出一套新的理论以支撑有限政府观念的努力。政治多元主义、价值多元主义和表达自由三个概念成为这一努力的核心,这三个概念又以多元主义为基础,以自由民主为目标展开。

盖尔斯敦以排除法规定了多元主义的标准。这一观念成为盖尔斯敦自由多元主义的一个基础,他主张的政治多元主义、价值多元主义和表达自由都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上的。他指出:

一个理论,如果它或者(a)把善归结为某一个价值规范,或者(b)对各种善进行了分层和排序,那么它就不是多元主义理论(符合a的理论通常称之为一元论)。一种道德理论如果既非(a),也非(b),那么,它就是多元主义的。<sup>①</sup>

政治多元主义就是在这样一个多元主义概念的基础上达成的。盖

---

<sup>①</sup> William Galston, *The Practice of Liberal Plural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11.

尔斯敦认为,政治多元主义(*political pluralism*)是:“一种对社会生活的理解,它包括了多种权威的来源,个人、父母、公民社团、信仰机关以及国家等等,没有哪一个在所有的领域、所有的情况、所有的目标中都具有统治地位。”<sup>①</sup>在盖尔斯敦的政治多元主义中,他反对把个人、家庭和团体简单理解为政治整体的一部分。相应地,他也把个人、家庭和团体完全视为“因为”某种政治目的而存在。这样,盖尔斯敦就以多元主义为起点将某些形态的极权主义排除在政治多元主义之外。盖尔斯敦就此得出结论认为:

政治多元主义认为人类生活包含多个领域,有些互相重合,各有独特的性质和内部规范。每一个领域都有有限但真实的自治。政治多元主义反对任何认为政治社会为这些生活领域排定了一个线性的先后顺序。相反,不同形式的团体和活动之间存在复杂的相互关系。在具体环境下,某个子系统内可能存在着局部或部分的等级关系,但是在人类生活的序列中,不存在总的排列次序。<sup>②</sup>

然而,盖尔斯敦也承认,多元主义者的政治应该负责调整其他领域的活动,尤其要对他们之间不可避免的重合和争夺进行裁决。这种政治显然要求某些个人自由和团体自由的互相制约。它垄断了对权力的合法使用,除非当政权不能或不去保护我们时进行自卫。<sup>③</sup>

同样,也是根据多元主义的这种判定标准,在以塞亚·伯林(Isaiah Berlin)的基础上,盖尔斯敦再次申明了价值多元主义(*value pluralism*)的理论。这一理论主张:“尽管好与坏之间的区别是客观存在的,但还是存在着多种多样的善,他们在质量上互相区别,不能进行排序。”<sup>④</sup>但是,

<sup>①</sup> William Galston, *The Practice of Liberal Plural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1.

<sup>②</sup> Ibid., p.40.

<sup>③</sup> Ibid., p.41.

<sup>④</sup> Ibid., p.2.

盖尔斯敦亦明确声明，价值多元主义也不是相对主义。好与坏、善与恶之间的区别是客观存在并在逻辑上可以证明的。盖尔斯敦声明：

不存在一个衡量所有不同质的善的共同尺度。不存在一个对所有的人都最为基本的至善。各种善之间也不存在一个一般的“字典排序”，也不存在“社会规范的第一美德”，而是相反，诸多公共价值的相对重要性是由特定环境决定的。<sup>①</sup>

盖尔斯敦甚至进一步把自由多元主义对于多样性的声称引入一个文化内部。他指出：“当自由多元主义者赞美文化间合法的多样性时，他们有所觉察的是，多样性同时在文化内部典型性地存在，而且，一个平稳的、同质的官方面孔常常掩盖着国家权力的秘密操作。”<sup>②</sup>

以价值多元主义为基础，盖尔斯敦进一步限定的国家的范围，即“国家可能合法地行动以防止人类状况中的大罪极恶(great evils)，但他们不能寻求强迫他们的居民在种种可以追求的生活中追求整齐划一的模式。任何公共政策，只要是依赖、加强或是强制推行人类善或是美德的单一观念，我们就可据以推定它是没有合法性的”<sup>③</sup>。

盖尔斯敦把避免大罪极恶的目标延伸到国际政治的领域内，确认了自由多元主义的底线。他指出：“如果说自由多元主义的国际政治有一个核心内涵的话，那么它一定是包括了改善这些罪恶，为其最后的根除而做出的努力。”<sup>④</sup>为了保证价值多元，盖尔斯敦主张在国际政治领域保证退出权。

实际上，即使是在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领域内，自由多元主义仍然强调了价值的排序。比如，盖尔斯敦明确认为：“自由多元主义者不能

---

<sup>①</sup> William Galston, *The Practice of Liberal Plural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11 - 12.

<sup>②</sup> Ibid., p.198.

<sup>③</sup> Ibid., p.2.

<sup>④</sup> Ibid., P.197.

接受,为了保障和平、稳定的政治秩序而牺牲其他的人类善,比如基本自由。”<sup>①</sup>这种典型的自由优先论体现了自由多元主义的自由主义特征。自由多元主义没有离开自由主义的大传统,盖尔斯敦在价值层面宣扬自由民主,在制度层面宣扬宪政民主的基本倾向也表明,作者是一个地道的自由主义者。但是,由于强调了自由主义在多元价值环境下的适应性,作者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而是一种后自由主义言说下的“新”自由主义者了。<sup>②</sup>

构成自由多元主义核心部分的第三个关键概念是表达自由(*expressive liberty*)。盖尔斯敦这里所谓的表达自由指的是这样一个假设:“它支持个体和群体在由价值多元主义定义的合法性变量范围内,根据他们自己关于什么样的生活是有意义和价值的理解,过他们认为合适的生活。”<sup>③</sup>盖尔斯敦简要地概括了表达自由的概念。他指出:“表达自由是指个人和团体在价值多元主义确定的各种合法选择的广大范围内,根据自己对人类生存的意义和价值的理解,以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生活并得到制度保证的能力。”<sup>④</sup>

实际上,这一概念如何得到践行?它是无限制的吗?尤其是,国家在这里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盖尔斯敦列举了大量的案例以宗教自由为个案论证了表达自由,进一步丰富了他在《自由多元主义》一书中提出的表达自由的概念。他把这一概念简要地概括为:

在一个自由民主社会,国家不是目的本身,而是达到某些高尚目的的工具。这些目的之一就是个人和团体具有按照他们对生活意义和目的的理解而生活的能力。也就是我所说的“表达自由”。

<sup>①</sup> William Galston, *The Practice of Liberal Plural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198.

<sup>②</sup> 相关分析请参考佟德志:《多元价值中的自由》,《浙江学刊》,2006年第3期。

<sup>③</sup> William Galston, *The Practice of Liberal Plural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2.

<sup>④</sup> Ibid., p.45.

它可以受到合理的限制，其程度是确保实践这一自由的制度环境。越过这一点，目的与手段的正当关系就本末倒置了。这就是自由民主国家不应该跨越的底线。<sup>①</sup>

从总体上来看，盖尔斯敦以多元主义为基础提出的这三个概念又是三个有机统一的整体。比如，他主张的价值多元主义与政治多元主义就是互相促进，互为补充的，他们共同在表达自由的基础上决定了自由多元主义在制度和文化上的两个维度。他将这种互动关系归纳为：“道德多元主义支持不应该把国家视为全能的观点，而政治多元主义则帮助界定和保护社会空间，在这个空间内，价值的多样性可以转化为丰富多彩而有意义的人类生活。”<sup>②</sup>因而，盖尔斯敦肯定地指出，政治多元主义与伯林主张的道德多元主义能够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找到结合点，共同为自由民主理论提供最坚实的基础。

在《自由多元主义》一书的基础上，盖尔斯敦进一步拓展了自由多元主义的领域，比如，把这一理论应用于对政治行为、道德动机的分析，再比如，把这一理论的应用范围拓展到国际政治领域。

对道德动机的讨论是自由多元主义扩展的一个重要方面。盖尔斯敦重提马基雅维利问题(Machiavelli's problem)，并把它解释为这样一个虽然令人不快但却司空见惯的政治事实：“即使最有价值的目标的实现，有时也需要使用让人厌恶的方式。”<sup>③</sup>盖尔斯敦从马克斯·韦伯(Max Weber)、迈克尔·沃尔泽(Michael Walzer)、伯纳德·威廉斯(Bernard Williams)和托马斯·内格尔(Thomas Nagel)的讨论出发，以韧性为中心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讨论。

<sup>①</sup> William Galston, *The Practice of Liberal Plural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68 - 69.

<sup>②</sup> William A. Galston, *Liberal Pluralism: The Implications of Value Pluralism for Political Theory and Pract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38.

<sup>③</sup> William Galston, *The Practice of Liberal Plural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76.

盖尔斯敦巧妙地把这一问题细化,区别为三个前后连续、互相联系的序列,即:第一个序列是从过于敏感的神经质到漠不关心的冷血,第二个序列是从热切希望到玩世不恭,第三个序列是从汉普舍尔所说的“洁身自好”到斤斤计较。这三个序列进一步可以归类为两个极端:即神经质、热切希望和洁身自好一方,冷血、冷嘲热讽和斤斤计较为另一方。实际上,盖尔斯敦最后还是回到韦伯:

我们每一个精神尚未绝望的人必须认识到有可能在某个时候在这个位置找到自己。只要是正确的,最终目标的伦理(福音或康德的伦理)与责任伦理并不是完全对立的,而是互补的,它们只有联合在一起才能造就真正的人——一个能够“热心于政治”人。<sup>①</sup>

细心的读者可能会发现,从自由多元主义的角度出发,盖尔斯敦对现实政治提供了一系列颇有教益的理解。比如,盖尔斯敦认为,宽容“应该意味着从原则上拒绝使用强制的国家权力把某种观点强加给别人,因此,它是一个承诺,承诺只单独通过补充和说服进行道德竞争”<sup>②</sup>。这些都成为自由多元主义理论应用于现实得出的结论,说明了自由多元主义的说服力。

应该说,对自由多元主义的种种批评实际上是进一步丰富了盖尔斯敦的理论。实际上,盖尔斯敦正是在对批评的回应中发展了先前提出的自由多元主义。在这里,包括了自由平等主义的批评,从而加强了自由多元主义的平等维度;对多样性的批评,加强了自由多元主义的多元维度等等。这些构成了盖尔斯敦对自由多元主义进行修正的主要原因和动力。比如,在第10章当中,盖尔斯敦通过回应罗纳多·德沃金(Ronald Dworkin)、布莱恩·巴里(Brian Barry)及苏珊·奥金(Susan Okin)

<sup>①</sup> William Galston, *The Practice of Liberal Plural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113.

<sup>②</sup> Ibid., p. 4.

的观点而修正和加强了自由多元主义在平等方面的内容。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这些批评并没有使作者放弃价值多元主义的立场,只不过是更加完善了。

其中,值得一提的是他对斯蒂芬·马塞多(Stephen Macedo)的回应。马塞多认为,盖尔斯敦理解的自由多元主义与民主之间存在着矛盾,其理论中包含的某些成分“是对制定公共政策的民主权力一个危险的攻击”<sup>①</sup>。盖尔斯敦认为,尽管自由多元主义为民主施加了种种限制,而这些限制可能会使民主陷入危险,但是,相比那种权力不受限制的民主来讲,自由多元主义对民主的限制而产生的危险要少得多。这里首要的问题是:“任何自由民主的理论都对民主权力的范围施加了原则性的限制。因此,除非我们准备接受我已经批评过的公民极权主义(civic totalism),那种认为特殊的规定或原则限制了民主权威的指责错过了这一点,任何规范都会这样做。”<sup>②</sup>

我们看到,盖尔斯敦对诸种批评的回应仍然是从对自由民主的角度出发的,自由多元主义的建立和发展都没有离开对自由民主的基本理解。盖尔斯敦在本书的开卷即明确地指出了自由民主的基本内涵,这对于我们理解其自由多元主义理论有很大帮助。他指出,自由民主

这一名词指向一种特殊的政治结构,在那里,人民作为一个整体直接或是间接地制定政策;更进一步地,它是指对政治的一种理解,在这种政治形态中,所有合法的权力都来自人民。它为我们限定了对于政治范围的一种特殊理解,在那里,合法的政治决策领域被认为在本质上是有限的。自由主义的治理承认,人类生活的重要领域在总体上或是局部上是处于政治权力的范围之外的。正因为

<sup>①</sup> Stephen Macedo, "The Perils of Diversity," *The American Prospect*, December 30, 2002, pp. 36 - 9.

<sup>②</sup> William Galston, *The Practice of Liberal Plural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192.

如此,它作为一个反对一切形式的全能权力的障碍而存在着,包括民主多数的权力。<sup>①</sup>

我们看到,无论政治多元主义和价值多元主义,抑或是表达自由,都是以论证这一政体模式为目标的。自由多元主义的三个核心概念就是自由民主理论的注脚,而自由民主的理解又是自由多元主义政体理论的基础。

似乎有点悖论的是,自由多元主义打破了某种价值的优先性,它又是如何为一个“好社会”提供智力支持的呢?盖尔斯敦承认,在关键问题上,多元主义者无法为好社会提供一个设计的蓝图,也就是说,它同柏拉图的理想国、卢梭的社会契约在基本前提上是不同的,甚至罗尔的两种正义的原则也不是一个好的底线。因而,多元主义无法为一个好的政治制度设计提供方案。但是,尽管如此,多元主义者在政体设计的基本理念问题上还是坚持了两点主张,即:

第一,每一个可接受的政体都该满足尊严的最低条件,也就是说,它会把自己组织起来以便使人类状况中那些极大罪恶最小化。

第二,符合了最低尊严条件的政体能够以多种多样的方式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所有的方式都是合法的,而且可能没有别的途径判断,考虑到事情的方方面面,正当的政体 A 比正当的政体 B 有更好的组织形式。<sup>②</sup>

正是从两个基本主张出发,盖尔斯敦明确地提出了自由多元主义的政体理论。其中包括对宪法的理解、治理理论、公民社会以及诸种公共问题的解决等。

盖尔斯敦从价值的角度理解宪法的制度建构,把宪法理解为“一套

<sup>①</sup> William Galston, *The Practice of Liberal Plural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1.

<sup>②</sup> Ibid., p.116.

公共价值的权威排序”，它在“非常广阔的、由价值多元主义划定的善的范围内选择了一系列价值的子集，并把这一子集推到非常显著的位置”。正因为如此，这些首选的价值就变成了制定和评估立法、公共政策以及其他事务的准则。<sup>①</sup> 他从三个维度来评价宪法，即现实主义、团结和合适。他进一步指出：

如果它加给公民的要求对他们来讲不太重的话，那这部分宪法是现实的；如果它包含的价值的全体能够共存，那这部宪法是团结的；如果其大体的框架与共同体公共文化的主流和共同体面对的情形是相吻合的，那这部宪法是合适的。<sup>②</sup>

我们看到，盖尔斯敦阐释的自由多元主义政体并没有离开自由主义，仍然与自由主义同门同宗；而且，盖尔斯敦对治理理论的这种阐释实际上也是基于西方社会的，即市场、公民社会、法律机制高度发达的社会。只有在这种条件下，自由多元主义的民主政体优于在现代条件可行的任何其他形式的政体。

## 二、公共问题与公共哲学

作为一个敏锐的政治哲学家，盖尔斯敦一直关注着社会的重大问题。在本书当中，盖尔斯敦特别指出了三个重要的公共问题，即：

由国家占支配性地位的工业经济向全球信息经济转变带来的**经济忧虑**，稳定的传统资源和意义逐渐衰落，比如核心家庭、邻里关系以及志愿组织，社会理解越来越集中于个人权利与选择，由此而

<sup>①</sup> William Galston, *The Practice of Liberal Plural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3 - 4.

<sup>②</sup> William Galston, *Liberal Pluralism : The Implications of Value Pluralism for Political Theory and Pract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66 ~ 9. William Galston, *The Practice of Liberal Plural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116 - 7.

带来的社会混乱，传统政党的衰落，由媒体和集中的经济权力控制的政治起而代之，这带来了政治**功能紊乱**。<sup>①</sup>

盖尔斯敦广泛地从经济、公民社会、治理、社会主义、市场与自由民主等多个角度指出了这些公共问题的具体表现。实际上，公民社会衰落的迹象，弱化的家庭、紧张的邻里、衰落的志愿社团、增加的依赖和对法律尊重的减弱以及其他种种，已经引起了人们普遍的忧虑。正是在对这些问题进行思考的基础上，盖尔斯敦发展了一种公共哲学。特殊性、文化性、具体性和政策性是这一哲学的四个典型特征。

盖尔斯敦否认了公共哲学的普遍性，而是将公共哲学的特殊性突出出来。在他眼里，公共哲学是在特殊的历史境遇中建立在特殊的公共概念的基础上的哲学。可能公共哲学会有一些普遍化的要求，但是，其特殊性限定了它不是一种普遍主义的理论，也不追求一种普遍化的结果。这构成了盖尔斯敦公共哲学的首要特征。

接下来，盖尔斯敦强调了公共哲学与公共文化的联系，这使得公共哲学进一步从普遍主义的约束中解脱出来。这种公共哲学认为，每一个政治共同体都拥有独特的公共文化，植根于特殊的历史和环境。这种文化提供了一种原则与善的合唱，从这些善的想象出发，政治秩序能够被塑造以及重新塑造。

因而，公共哲学是具体的，这构成了公共哲学的第三个特点，它把像“人人生而平等”这样的抽象命题同特殊的社会—政治制度观念联系起来，在美国的语境下表现为以自由民主和宪政民主为名的一系列具体化的要素，如权利、市场、公民社会、政府、法治等。然而，就具体的公共政策来讲，公共哲学又能超越原则和制度，在理解世界如何运作的基础上界定了公共政策的一般方向。这构成了盖尔斯敦公共哲学的第四个特

<sup>①</sup> William Galston, *The Practice of Liberal Plural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121.

点。因而,我们看到,公共哲学是为问题而生的哲学,它代表了一种去解决特殊公共问题的努力。<sup>①</sup>

在那些引起人们广泛关注的公共问题中,市场对自由民主的影响就是一个。盖尔斯敦观察到,尽管自由民主市场社会的公民生活稳定而平和,但是,公民生活弱化的种种迹象也引起了人们的普遍担心和忧虑。政治参与不断减少,人们对政府的信任和信心大幅下降,特殊利益群体却如雨后春笋般激增,联系社会团结的纽带却日益松动。这不仅是罗伯特·普特南(Robert Putnam)为首的一批学者的观察,同时也引起了盖尔斯敦的关注。他试图以自由多元主义的角度来分析这一现象。就民主与市场的关系,盖尔斯敦的观点非常明确:

就我们所知,对民主政治制度来讲,一个相对自由的市场是必要的,但却不是充分的条件。对这种关系一种似是而非的解释是,尽管自由民主是一种有限政府的形式,但是,民主政治(像所有其他政治制度一样)有一种打破限制,扩张权力的天然倾向,除非遇到了制度化的抵制,在这些能对民主进行抵制的制度中,市场是最重要的。<sup>②</sup>

在这里,盖尔斯敦引彼得·伯杰(Peter Berger)为同路,对经验事实进行了分析,即在政治实践中,我们找不到没有市场经济却实行自由民主政治的例子。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讲,自由市场与权威主义的结合可能更容易成功,皮诺切特时代的智利、普京时代的俄罗斯都是明显的例子。但是,我们可能更清楚地看到经济增长对民主政治的效应。其过程是:“经济增长存在着扩大中产阶级的倾向,这又会导致对个人自由和集体自治要求的增加。除此而外,我们有证据证明,经济增长产生了普遍的

---

<sup>①</sup> William Galston, *The Practice of Liberal Plural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116–120.

<sup>②</sup> Ibid., p. 128.